

从“九一八”到“七七”

温 济 泽

九一八事变时 我 17 岁 正在上海读书。1931 年 9 月 18 日晚 日军制造柳条湖事件 旋即以此为借口悍然攻占沈阳。第二天，我们就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惊人的消息。接着，日军又占据本溪、安东、辽阳、营口、抚顺、长春等近 20 个重要城镇。此后仅 4 个月，日军即占领了我东三省大部分国土，3000 万同胞遭到残酷的蹂躏和野蛮的屠戮。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都是中国人啊！

当时中国东北驻军大部执行了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即便如此在日军进攻沈阳的当天夜里，仍有部分官兵和警察、公安部队违令奋起抵抗。此后，日军铁蹄所到之处 反抗侵略的义师如潮 烽火四起。几个月内 东北爱国军民组织起 30 多万抗日义勇军和其他形式的武装。张学良将军受着“不抵抗”命令的压力，也暗中从北平军分会批拨枪弹、现款、物资援助义勇军。中国人是不可侮的！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激起全国人民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各地各界纷纷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出兵抗日。学生抗日运动的声势尤为浩大。规模最大的请愿是 1931 年 11 月 26 日那一次 上海、北平等地请愿学生约两万余人集中于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这次请愿，我也参加了。我们这些从各地来的学

生代表在国民政府大门外的广场上，我在前几排上海复旦大学学生的队伍中间，在凄风苦雨中站了一整夜，到第二天下午一点钟，蒋介石才出来接见。在激愤的群众面前，他敷衍地答应“三天之内出兵”。学生要求他写下字据以便带回去出示广大同学，他借口“回去写”就退走了。一会儿，送出一个“手谕”，以“对于诸生请愿，自可接受”，“望转告各同学安心求学，拥护政府”等空言搪塞，只字不提出兵抗日。学生知道上当，到12月17日又有两万多人集中到南京，这次不再是请愿，而是各地学生联合大示威。国民政府竟派军警开枪镇压，在南京珍珠港桥造成流血惨案。上海文生氏英文专科学校学生、共青团员杨桐恒当场牺牲，伤百余人。我亦是现场目击者之一。

日本帝国主义在强占我国东三省之后，为了转移国际视线，掩护它炮制“满洲国”，把我东北变成它独占殖民地的步骤，又在上海制造事端，于1932年1月28日晚发动进攻，企图占领上海，这就是一二八事变。

当时驻在上海的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和军长蔡廷锴的率领下，奋起抵抗。第五军军长张治中在促使蒋介石认可后，也率部参加了作战。在我国军队的英勇抗击下，日军屡战屡挫，伤亡惨重，被迫三易统帅，并不断增兵，使其侵略上海的兵力从数千人增加到六七万人。而我军人数不足四万人，要求增援，竟被蒋介石拒绝。这样，我军经过一个多月的浴血抗战，终因敌众我寡，被迫于3月1日撤退。国民政府从战争一开始就惊惶失措，开战两天后迁都洛阳，并暗中与日本妥协，经过谈判终于于5月5日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

在淞沪抗战期间，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热烈支援。各地各界参战的义勇军就有 5000 多人。其中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众反日救国义勇军有 2000 多人，它的前方办事处设在十九路军前线指挥部的隔壁，在执行救护、运输、募捐、宣传、慰劳等任务中，同十九路军配合得很密切。全国同胞和海外侨胞捐助现款、食品、日用品、药物、器材等也非常踊跃，仅捐款一项，就达 700 多万元，而军政部欠发十九路军的军饷竟达 600 多万元，蒋光鼐将军曾感慨地说：“淞沪之役，我军得民众莫大之帮助，近者笔笔食壶浆，远者输财捐助，慰劳奖励，永不敢忘。”

淞沪抗战失败以后，群众抗日运动继续高涨。运动的中心内容是反对上海停战协定和继续援助东北义勇军。5 月，上海市各界成立民众反对停战协定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会（简称“民联”），我这时是共青团复旦大学支部书记，被选为民联青年部部长。6 月，由上海市民联等 80 多个抗日团体联合成立全国和江苏全省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自由市代表大会筹备处，我又被选为筹备处的青年部部长。接着，筹备处又于同年的 7 月 17 日召开了民联的江苏省代表大会，但事机不密，当场被捕 88 人，我在其中。被捕后，经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押解到国民政府军政部军法司转南京警备司令部，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决，萧万才、曹顺标、邱文治等 13 个同志牺牲于雨花台，70 个同志被判处无期和有期徒刑，除两个女同志留在南京坐牢外，其余都被囚禁到苏州军人监狱。政治黑暗如此，爱国竟然有罪！

我们身陷囹圄，心系祖国命运，被锁在高墙囚室之

内，仍不时伺机买通看守，高价秘密地断断续续地买进报纸。这使我们零星地得知：1933年初，日军侵占热河和进犯长城各口，当地军民奋起抵抗，同年11月，福建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宣布反蒋抗日，不久失败；1935年，签订“何梅协定”，致使河北和察哈尔的主权大部丧失；日本帝国主义又策动汉奸搞起“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使华北形势危急达到极点。在这种形势下，北平学生于12月9日爆发了一二九运动；1936年，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我们得到这些消息，片片断断而不连续，隐隐约约而不清楚。狱中生活，浑如隔世。然而，我们的心却时刻系念着祖国的安危。

1937年8月，狱中仍是一片死寂，但监狱上空不断有作战飞机飞来飞去。我们开头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后来向看守打听，才知道发生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八一三事变，中国军队在上海也同日本侵略军接火了。这时狱外带进信来，暗示我们“大哥二哥多年不睦，近已握手言和”，我们猜想国共两党可能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了。

国共两党谈判的条件之一，是国民党释放全国政治犯。当时我们党的谈判代表是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同志。在达成协议之后，他们到南京监狱里看望过一些同志，这些同志当即释放了。其他同志也很快释放了。我们在苏州的，要晚一些。此时关在苏州军人监狱的政治犯约400人，是按刑期长短分批释放的。我的刑期较长，在8月30日第三批释放。5年多不曾呼吸新鲜的空气，没有见到明亮的阳光，一朝除去脚镣，走出囚笼，还感到不大适应，但毕竟获得自由了，顿觉心花怒放。

上海一带正在炮火纷飞，交通受阻，我和另一位出狱的同志克服种种困难，绕道嘉兴，回到上海。我找到了半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很快同江苏省委取得联系。当时党的组织正在恢复中，省委决定我留在上海，同省委单线联系，负责党内文件和党刊的发行工作。11月初，上海将沦陷，省委为做好准备，决定只留下少部分同志隐蔽起来，把多数同志分散到上海以外去开展工作。

当时我的叔父温崇信在昆山，后又到太仓当县长，因支援八一三抗战有功，被调往安徽六安，任安徽省第三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李宗仁先生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时，省政府迁到六安。党便利用这个关系，派我到叔父那里参加抗敌后援会的工作。其后，我在六安参加创办了抗战训练班，招收当地男女中学生 100 多人，接受抗战的政治和军事训练。当时，当地的党组织还没有恢复，我就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同志联系，训练班用的政治形势、游击战争、战地服务、战时救护等教材，也都是董必武同志寄给我的。当时年轻学员的那股抗战热情，两党合作和全民团结抗战的那火热的局面，今天想起来仍令人兴奋。1938 年 2 月，李宗仁先生去职，我的叔父也去职往重庆北碚复旦大学教书（他原是复旦大学教授），我则直奔革命圣地延安，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火热的敌后抗战中去。

值此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之际，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我回忆这段经历，是想敬告同胞，特别是青年和后人，永远毋忘从“九一八”到“七七”这段屈辱和悲壮相交织的历史。

毛主席关怀我们办抗大

莫 文 骅

抗大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倡导和主持创办的一所专门为抗日战争储存、培养、输送军政干部的学府，是革命的大熔炉。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抗大创办 9 年由最初的数百人，直至发展成为拥有 12 所分校，数万名学员先后为各个抗日根据地输送了 10 万余优秀儿女，他们中既有能征善战、统领千军万马的高级将领，也有战斗在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基层干部。在抗大创办初期，我先后担任过校党总支书记、政治部主任等职务。当时学校的领导人，于今在世的仅剩我一人了，我有责任将这一段历史写出来，藉以深切地纪念那些在中国人民抗日斗争中建立了功勋，血洒疆场的热血青年和抗大学员们！

毛主席的战略眼光

1936 年是一个非凡的年代。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苏维埃根据地，刚刚立足。日本侵略者占领我东三省后又把魔爪伸向了华北，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全国人民把期盼的目光聚焦到了陕北，把拯救中华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党中央、毛主席没有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早就把

这一历史的重任担在了自己的肩上。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预见到抗日高潮来临，将需要大批的干部去领导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5月14日毛主席在黄河西崖的大相寺主持召开了一个会，决定成立红军大学。毛主席将她定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当时战事频繁，前线很需要干部，一些领导同志舍不得送干部去学习。会上，毛主席亲自做工作，说服一些领导同志，为了抗日，把眼光放远一点，送优秀干部到红军大学去学习。

6月1日陕北瓦窑堡旧庙堂前红旗招展，歌声嘹亮。数十名优秀的红军干部会聚在这里，举行“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会场布置得庄严简朴，庙墙上贴着红绿标语。临时搭起的一个土台上，悬挂着红布横额。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学校的几位负责人坐在主席台上。毛主席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开门见山地说：我党创办抗日红军大学，是为了促进和迎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着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学校创建初始分3个科，第一科大都是红军师以上干部，有林彪、罗荣桓、罗瑞卿、刘亚楼、陈光、张爱萍、彭雪枫、陈士榘、杨成武、谭政、周建屏、彭加伦、王平、耿飏、刘惠农、边章武、许建国、苏振华、张纯清、张树才、张经武、张达志、宋裕和、赵尔陆、贺晋年、郭述申、黄永胜、谭冠三、张文彬、杨立三、邓富连、刘鹏、吴富善、罗

保连、贾力夫、符竹庭、童小鹏、肖之玖 还有朝鲜的武亭和越南的洪水同志。我原是西北红军大学的政治部主任，经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杨尚昆同志批准，也成为第一科学员。学校由毛主席兼任政治委员。其他职务均由学员担任 林彪为校长 罗瑞卿为教育长 我任校党总支书记 当时不设政治部，就由校党总支书记来负责这方面的工作。

1937 年 1 月的一天，毛主席找林彪、刘亚楼和我 3 人去谈话 要我们到延安办“抗大”二期。我们 2 月到达延安后不久 学校即更名为“中国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林彪任校长 刘亚楼任教育长 我任政治主任 后改为政治部 傅钟任主任 我任副主任（傅钟到前方后 我任主任），学员中四方面军的多一点，也有红一方面军和二方面军的干部。有陈赓、杨得志、余秋里、姬鹏飞、许世友、胡耀邦、倪志亮、王维舟、王建安、陈再道、洪学智、詹才芳等 女干部有贺子珍、康克清、蹇先润、蹇先佛、李坚贞等。还有一些国民党军队系统的高级将领，大都是杨虎城和张学良将军部队里的进步军官，他们化名来学习。也有一些来自国民党将领的家庭，如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张学思，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民，国民党师长赵寿山的儿子赵元介、女儿赵元炳。但大量的是满怀抗日救亡激情的热血青年，他们中有来自平津和东北沦陷区的青年学生，有东南亚新加坡等地穿着翻领西服、旗袍、高跟鞋来到延安的华侨青年。这些进步青年三三两两 男男女女 背着行李 掂着小包，日夜不停地投奔延安。从西安到延安有 800 里路 路上有国民党的严密封锁，荒山野岭常有豺狼、狐狸出没和嚎叫，无数青年靠两只脚星夜赶路，有的要走半个多月，

到延安时，脚肿得连鞋都脱不下来，那种情景是非常感人的。

抗大就像一颗在沉沉黑夜里闪耀的北斗星，把大批的革命青年、抗日志士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异国他乡召唤到黄河之滨、宝塔山下。

在战争环境里，创办这么一所大规模的学校，抽调这么多高级将领来学习，充分证明毛主席具有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和革命家的宏才大略。他深知，在革命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我们党和军队的任务、策略、斗争方式及工作方法都将有所改变并复杂起来，这就需要干部重新学习并掌握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主动地适应这种战略转弯。更需要吸收大批新的干部 增加新的血液。

毛主席给我们当“教授”

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为我们抗大的创办倾注了满腔心血，给予了极大的关怀。抗大创办初期，主要课程都由中央领导同志担任。毛泽东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张闻天讲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凯丰和吴亮平讲政治经济学；秦邦宪讲授联共（布）党史和辩证唯物主义；杨尚昆讲授各国论；李维汉讲授党的建设等。苏联顾问李德也给我们讲过课，主要是讲兵团战术。为了帮我们在时局转换的关头转弯子，毛主席也殚精竭虑，废寝忘食 不分昼夜地备课。给我们讲政治形势、党的政策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的演讲既高瞻远瞩，又细致入微 针对性强 分析问题精辟入理。

毛主席这些大“教授”非常平易近人，他们来讲课，既不兴师动众，也不戒备森严。有一次，他和张闻天、秦邦宪、徐特立等同志来到我们一科驻地。当毛主席等领导同志走进教室时，大家站起来热烈鼓掌，毛主席微笑着摆摆手，让我们坐下。他先介绍了跟随他来的几位领导同志，然后说：“我今天帮你们请来几位教员，有洋的，也有土的，我就是土的一个。”当介绍到徐特立时说：“他不仅是你们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接着，他说：“我们前一段时间，用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孙悟空会腾云驾雾，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我们不会腾云驾雾，也走了两万五千里。要是会腾云驾雾，就不晓得会走到哪里去了。现在，我们红军从过去几十万减为两万多人，要不是刘志丹帮我们安排好这个落脚点，我们不知要到哪里去呢！反正我不到外国去。中国的地方大得很，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还有北方。当前，党中央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把反蒋抗日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就是要逼蒋介石走抗日的道路。”

在我们第一期学员即将毕业时，西安事变发生了！消息传来，我们欣喜若狂。

事隔几天，中央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对这一决定，我们有些人在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觉得蒋介石杀了我们那么多人，又一向奸诈刁滑，不能轻易放虎归山。

为了把学员和干部的思想统一到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上来，12月26日，即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的第二天，毛主席又亲自来到红大，给学员和中央机关干部作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他说：在目前的形势下，杀了蒋介石

石，会使国内形势更加复杂和混乱，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何况杀了一个蒋介石，还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蒋介石。诸葛亮对孟获还搞七擒七纵，我们对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一擒一纵呢？他风趣地说：陕北毛驴很多，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抗战的，我们就用对付赶毛驴上山的方法，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他。这就是我们党“逼蒋抗日”的方针。

我们听了毛主席的报告茅塞顿开，思想豁然开朗。

后来在抗大毛主席又给我们讲了《实践论》、《矛盾论》和《论持久战》使我们受益匪浅。

毛主席的办校作风

抗大是毛主席亲手创办起来的，也是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成长壮大起来的。毛主席办学校有一套独特的作风。他既总揽全局，又放手让学校干部大胆工作。抗大刚开办时，他兼学校政治委员，后来又兼任抗大的教育委员会主任，但一些具体工作都由学校干部去做。抗大刚开办时，他让我们几个学员担任学校领导工作，这在我军和世界教育史上是从没有过的。

在办学中，毛主席注重抓干部，特别注重干部的培养和使用。抗大的一些主要领导都是毛主席亲自挑选并任命的。1937年5月，胡耀邦同志到我们抗大学习，并任一队支部书记。有一次，我陪毛主席参加他们的支部大会，坐在边边上，胡耀邦那时才22岁，朝气蓬勃，说话很有条理，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毛主席问我这么小的同志是谁，我说是胡耀邦，是一队的支部书记。从这时起，毛主席

记住了胡耀邦同志。那时，抗大校长林彪到前方，罗瑞卿教育长和我俩具体负责抗大的工作。我还兼政工作课，工作很忙，想找个人来分担一点我的工作。过了两个月，我提出让胡耀邦同志任副主任兼总党支书记。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罗瑞卿同志，请他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对胡耀邦同志印象不错，很快就批下来了。

毛主席很重视学员的作风培养，特别是艰苦奋斗作风的锻炼和培养。他常对我们说，学员的作风培养好了，到部队后就是一面象样的旗帜。

1936年7月国民党军高双城部偷袭瓦窑堡后，学校还一度迁到了保安县（今志丹县）办学。保安是陕北的一个偏僻小县。四面群山环绕，土地贫瘠，人烟稀少，物产匮乏。是一个“破庙比房多，菩萨比人多”的穷山窝。保安城外的山坡上稀稀拉拉长着几丛酸枣，石壁上露出几十个黑黢黢的洞口，远远望去，好象蜂窝似的。这些石洞是哪个朝代开凿的，已无从考证，据说是供奉“元始天尊”的。长期没人居住，有的做过羊圈，有的是兔窟狼窝。这些乱石纵横、狼藉不堪的石洞，就是我们的校舍。

我们的教室选在一个最大的石洞里。它原是一个羊圈。我们把羊粪、杂草清除掉，打扫干净，用石灰水把洞壁刷白，在石壁上凿出一块大石板，用石头砌成了一个挺象样的讲台。在洞口，我们用石块垒成墙和门，用茅草编成厚厚的草门帘，平整了场地和道路。这样，一座以石洞为教室，以石壁为黑板，以石头为桌凳和讲台的大学课堂建成了。这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学课堂。

我们住的也是石洞，睡的是石头砌成的床铺。

生活虽然艰苦，但我们学习却很用功。除了听课，就是自学或讨论。石洞里很暗，我们便在外面看书，看书累了就眼望蓝天游云漫谈讨论。一次有个同学对“货币”半懂不懂的。他想到有个同学借了他的钱，便跟大家说：“谁借了我的货币？”大伙笑了起来，也引起了一番争论，最后总算把“货币”弄懂了。徐特立先生给我们讲新文字（即汉语拼音）我们很感兴趣。我和彭雪枫、张爱萍等同学商量好用新文字通信。通了几次，问题就来了，原来我们用的都是方言难以沟通。每天晚上我们坐在石凳上，捧着书本俯首石桌，在油灯和烛光下啃得津津有味。大家总是把配给的油点光、蜡燃尽才肯上床睡觉。

毛主席对我们这种一面学习，一面生产艰苦奋斗的作风非常赞赏。一天毛主席讲话诙谐地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中修炼。什么时候下山呢？天下大乱你们就下山！这既是对我们的表扬，也是对我们的鼓励。从抗大开始，我们就把毛主席倡导的“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作为一种优良作风继承下来。

1937年3月，毛主席为抗大同学会成立题词：“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并把它作为抗大的教育方针规定下来，这是对抗大艰苦奋斗作风的又一次肯定。

毛主席身体力行，对学员关怀备至。在抗大时，我们学习很刻苦，星期天也不休息，毛主席知道后，特地派杨尚昆同志来传达指示，要我们注意劳逸结合，爱护身体，并硬性规定我们星期天不得呆在宿舍。

毛主席还多次为抗大题词，或者亲自给学员复信，勉励抗大的学员们。红军时期我们管军人俱乐部叫“列宁室”。抗日战争爆发后，抗大九队的学员将列宁室改为“救亡室”。毛主席得知后，亲笔给九队的学员写信：“九队的同志们：庆祝你们成立了救亡室，救亡二字就是你们及全国人民现阶段上的唯一总目标。达到这个目标的道路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希望你们学习这个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方法。唯有统一战线，才能达到救亡的目的。”有的学员碰到一些难题，不好解决，也直接写信给毛主席，毛主席总是在百忙中给予答复。有一个同学因入党问题长时间得不到解决，给毛主席去信，毛主席给回了信，并要他拿着信去找组织解决问题。还有个叫于江的学员，也是碰到了难题，找到了毛主席，毛主席为其题词：“碰了钉子时，就向钉子学习，问题就解决了。”后来这个学员牺牲了，为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毛主席这种平易的工作作风，为抗大干部和学员作出了榜样。

毛主席倡导的抗大校风

抗大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校风，这就是毛主席倡导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1937年4月的一天，林彪从毛主席那里回来，给了我这8个字，字不大，是毛主席亲笔写的。我叫政治部的同志用红布把这8个字放大，剪了贴在校门口。从此，这8个字就成了我们抗大的校风。

在抗大，学员和干部不论来自何方，大家团结在抗日

的旗帜下，关系非常的融洽。一日生活也非常的紧张有序。抗大的校规也是很严格的。有的事情，毛主席亲自管。抗大来了很多男女青年，为了让大家集中学习，我曾向主席建议，学习期间不许谈恋爱，不许结婚。毛主席同意了。我们还专门发了一个通知。可是不多久，一位校领导和一个女生结了婚。当时，毛主席知道了，火了，要撤他的职，给他处分。我写信给毛主席，为他讲情，请主席“收回成命”。主席叫我去，把我训了一顿说：“不许谈恋爱 不许结婚是你提出来的，现在讲情的又是你，都是你。我只好当面作检讨。”再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黄克功，他原是个团政委，六队队长，是个很不错的干部。有个女生与他谈恋爱 黄提出要与她结婚 女的不干 黄火了 拔出手枪把这个女生打死了。按照党纪和边区的法律应该枪毙他。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为他求情，主席不同意，亲自给雷回了一封信。罗瑞卿也找主席讲情，被主席狠狠训了一顿。后来还是将黄枪毙了。起初，一些女生是很痛恨黄克功的，但看到处理得这么重，反而同情黄了，有的女生都哭了。还有个叫吉司恭的，几个女青年在西安要去延安入抗大，没有门路，碰到了他。他说他是抗大的政治部主任，是来西安招生的。她们以为碰到了救星。有几个女青年被他哄骗奸污了。他知道闯了祸，跑到陕北公学上学去了。这几个女青年后来还是到延安入了抗大。当时抗大的政治部主任是我，她们以为换了人。一个星期天在延河散步时，她们无意中发现了西安的那个“政治部主任”是冒充的 就揭发出来 经法院公审枪毙了 我是陪审员之一。可见，抗大的纪律是非常严肃的。

抗大是革命的熔炉，也是青年人的天地。因此，课外生活非常的轻松活泼，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为了活跃文化生活，强调领导带头。有一次，为了欢迎朱总司令从四方面军回来，我们赶排了一个文艺节目，由罗瑞卿、张爱萍、宋裕和等同志自编自演。原来让高个子耿飚同志饰蒋介石，他执意不肯。罗瑞卿同志长的也比较高瘦，后改由他演蒋介石，演的还挺象。剧中还有一个小脚老太婆，由宋裕和同志扮演。当他穿上借来的老太婆衣服，认真地用脚后跟一拐一拐地学小脚老太婆走路时，惟妙惟肖，台下的观众连眼泪都笑出来了。除了文化娱乐外，我们还修了篮球场，在球场上埋下 4 根柱子，钉上几块木板 找两个桶箍代替球筐。尽管简陋 但玩的很开心。在抗大时，朱总司令打球的兴致特别高，休息时经常找我们打篮球。他一般是打前卫 我打后卫。我们看他年纪大，就有意让着他点，他带球跑几步，裁判也不吹哨，这样他觉得我们是另眼相看，嫌和我们玩的不过瘾。于是便和女同学一起打球。女同学可不管这些了，有时推他几下，撞他几下，还常常盖他的“帽”朱总司令不但不生气 反而乐呵呵的 因此 女同学们都管他叫“老外婆”。我们还有一个自建的网球场，国际友人斯诺和马海德都曾来我们抗大打过网球。

在延安，最有名气的还是抗大的歌声。每天早晨，在延水河畔，在宝塔山下，都能听到抗大学员那高亢嘹亮的歌声。每次集会各学员队都互相拉歌，《大路歌》、《毕业歌》响彻云霄。特别是凯丰作词 吕骥作曲的《抗大校歌》，尤其有感召力。一批批优秀的中华儿女，一批批的热血青

年 正是唱着这首歌 奔向敌后 奔向前方 奔向了抗日的
战场。

（冷博军 整理）